

唐宗詩詞新話

雷
樹
田



封扉题字：霍松林

唐宋诗词新话

雷 树 田

陕西人民出版社

唐宋诗词新话

雷 树 田

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 印张 2 插页 87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0183—X/I·48

定 价：1.45元

序 言

诗话、词话，是一种以札记和杂感的形式，自由活泼地谈论诗词各种问题的论著。溯其源，如果承认“词”是“诗之余”，那么，诗话、词话的源头可以推到钟嵘的《诗品》，甚至孔孟和先秦诸子论诗的片言只语那里去。但是，严格地讲，诗话体制的定型，是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的，词话则是宋词繁荣之后的产物。从唐圭璋先生辑录的《词话丛编》中的历代八十五种词话来看，宋人王灼的《碧鸡漫志》和张炎的《词源》都较早，且二者论词的内容、体例等也较系统。所以，我们可以说，词话的真正定型，也是从宋人开始的。

郭绍虞先生在《清诗话·前言》中指出：自钟嵘的《诗品》和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问世以后，《诗品》代表了一种属于文学批评中态度较为“严肃的著作”，而《六一诗话》则代表了一种属于文学批评中态度较为“轻松随便”的著作；“严肃”的偏于理论，“轻松”的偏于批评或叙述；“偏于理论的必须条理精密，系统分明”，“偏于批评或

叙述的，不妨随所触发，信笔即书”，从“轻松平凡的形式中正可以看出作者的学殖与见解”。后代的诗话、词话作者，基本上都是沿着钟嵘和欧阳修的倾向，繁衍、派生着自己的“作品”，大都使“严肃”与“轻松”交流并进在自己的“话”著中。

我很同意郭绍虞先生“轻松平凡的形式中正可以看出作者学殖与见解”的观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板着面孔、道貌岸然地为读者讲“经”说“道”呢？为什么不可以象敦煌变文一样，将儒、佛、道家的“化人向善”的玄理，借助民众便于接受的活泼泼的形式，在说、唱、念、做之中，让人愉愉快快地消化吸收了呢？所以我说，文学批评以及论诗说词之著，必须提倡“轻松一体”，使其成为“广大教主”，议论的方面较为广阔，既有趣味（当然不是强凑泊），又有知识，兼寓哲理，的确是一种理论的“方便法门”才好。

傅庚生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诗（词）话在我国不仅是特有的民族文学形式，而且渊源久远，影响甚著。历代诗（词）话，在质量上无疑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的；在数量上，宋元以来直至近代，诗话、词话何啻数百种！而现代，诗话、词话的创制似乎被人冷落了，一些人在轻视它，以为是‘小道’，不曾深入地想到它的高度的学术价值，让贵古贱今的流弊一直影响着不少人的头脑。所以，在

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一定影响的今人理论古代诗词的诗话、词话，至今未曾见到……”我很欣赏先生的高论，除了协助先生及其贤裔组编《集纂百家唐宋诗（词）话》外，奉先生的建议，将多年来学习研究唐宋诗词的一些心得体会进行了整理，不料竟然积篇成帙，于是，不揣冒昧，名为《唐宋诗词新话》，交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部，同时《陕西日报·秦岭副刊》也连载了其中较为短小的篇章。我自知水平有限，但愿抛砖引玉，高明君子必不过责。

《唐宋诗词新话》所以能够成书，还须感谢霍松林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他说：“唐、宋是两个紧接着的历史时代，懂唐诗，不研究宋词、宋诗的人，是令人遗憾的……”一九八四年十月，霍先生又支持我去开封、洛阳、南京、杭州、绍兴、宁波一线进行资料搜集。在南京，我拜见了著名词学大师唐圭璋教授。唐先生教导我“转益多师”，力争成为一个由唐到五代，到宋，到敦煌文学，都有所进展、有所积累的人。他又书荐我去扬州师院向他的好友、著名教授任半塘先生请教。他们的教诲，都使我坚定了“学唐兼宋”的研究道路。因此，《唐宋诗词新话》也可以说是献给诸位老前辈的一份不怎么成熟的答卷。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尽量注意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相结合。其次，本书所议论的问题，大

多系一般文章不谈、少谈，或者是作者觉得能够从别人的所见中再探讨点自己的不同见解的问题。在选题方面，有形式格律方面的问题，有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有作者生平轶事方面的问题，有文学主张批评标准方面的问题，有铨释考证方面的问题，有文人诗词与民谣俗语方面的问题……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力争文字简练，篇幅短小，活泼生动，发人深省。这是作者的主观愿望，客观上是否这样，还有待读者指正。

本书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部有关同志，以及西北大学中文系董丁诚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帮助；在书稿发排前夕，又蒙霍松林先生特为题笺，在此一并致谢。

雷树田

一九八六年二月

目 录

1. 唐诗与唐太宗 (1)
2. “直言极谏”与唐诗繁荣 (5)
3. 李白“活中守法” (8)
4. 杜甫与“文人相重” (12)
5. 杜甫很重视“文律”和“诗律” (17)
6.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新解 (19)
7. 到处自凿井，不能饮常流 (24)
8. 陆长源曾“权领”湖州刺史 (27)
9. 《罗浮山人与葛篇》之我解 (29)
10. 李商隐感慨不尽于“二十五岁之年”
..... (31)
11. 李贺之“五粒”新探 (35)
12. 最早的“边塞词”之一二 (37)
13. 小议王禹偁遭贬 (39)
14. 再论《望江南》词与“盗甥” (42)
15. 从“一服不持”说起 (45)
16. “铁门限”诗 (48)
17. 黄庭坚的《咏水仙》 (50)

18. 宋诗多议论，但亦多哲理…………… (52)
19. 宋诗中的朝鲜人诗举例…………… (56)
20. 宋诗与科场舞弊…………… (59)
21. “可是僧中英特人”解…………… (61)
22. 宋词中的“美人春睡图”…………… (63)
23. 陈师道的《临江仙》与马致远的《天净沙》…………… (65)
24. 小说“饱吃梅花数斗”…………… (66)
25. 宋人有诗二句可妙解《水浒》书名的含义…………… (67)
26. 不可小觑《镜湖》绝句…………… (69)
27. 五十年前二十三…………… (72)
28. 暗用九“锡”字我解…………… (74)
29. 侯蒙的《临江仙》与《红楼梦》中的《咏絮词》…………… (76)
30. 真德秀的“官民观”…………… (79)
31. “月子弯弯照九州”何来…………… (81)
32. “风俗贱松”故事…………… (83)
33. 看似平淡，思之有味…………… (85)
34. 诗中“长安”须细看…………… (87)
35. 忍使书生作夜巡…………… (88)
36. 朱子不通胡子性…………… (90)
37. 用前人字句，不可并意用之…………… (92)
38. 尺纸从头彻尾空…………… (95)
39. “三种境界”与“三种道理”…………… (97)

40. 不管世人皆欲杀，夜深江上弹琵琶……(100)
41. 俗语入诗自有妙用……(102)
42. 也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出处……(105)
43. 慨叹才大难用的《盆荷》诗……(107)
44. 岳飞的后代多有文才……(108)
45. “南风”与“翻书”索解……(110)
46. 半是交情半是私……(112)
47. 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114)
48. 学人而不依傍于人……(116)
49. 琢雕自是文章病……(118)
50. 陈妙常能词……(119)
51. 陆游爱情多悲剧……(121)
52. 从权力高峰堕入生活底层的写照……(123)
53. 依样画葫芦……(125)
54. 朱虎臣生不逢时……(128)
55. 说顿起的《二喻诗》……(130)
56. 王奕《送谢叠山先生北行诗》……(134)
57. 生前的误会与死后的赞扬……(137)
58. 一男一女朱希真……(141)
59. “莺花”的暗示……(144)
60. 气象混沌，难以句摘……(146)
61. 民谣民谚一语中的……(149)
62. 又岂以世间声律为拘拘……(151)

1. 唐诗与唐太宗

人们多称颂盛唐诗歌，而对初唐诗坛则往往概之为“齐梁颓风，上官宫体”。事实上，初唐正是由“齐梁颓风，上官宫体”向“大唐诗风，格律正体”过渡的重要时期，难免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之感。但是，应当看其主流和本质之所在。

明人高棅在《唐诗品汇》序中说：“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齐梁诗风——引者），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盛也。”据不完全统计，初唐活跃在诗坛的诗人有三百余人，诸多有益于人生社会的作品见诸典籍者，洋洋可观，无庸枚举。我以为这和唐太宗提倡“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严防如“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文体浮华，无益劝诫”的作品重新出现的主张以及身体力行有一定关

系。

一提起唐太宗，人们多以其为英明帝王，或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对他在文化艺术上的贡献很少论及。其实唐太宗早在贞观初年和监修国史的开国元勋房玄龄，以及著作佐郎邓世隆的谈话中，就对当时文风问题发表过尖锐的批评意见。他认为凡为文或“制令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貽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在《帝京篇序》中，唐太宗则更具体系统地提出了他关于诗文创作的理论。他说：“余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殫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域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瞻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余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慢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人神，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

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尔。”（《唐诗纪事》卷一）其实质是倡导以“复古”为“革新”开路；对汉赋及六朝诗赋的批判也重在“释实求华”，并非重在体裁形式。

唐太宗不仅有创作理论，而且能将理论付诸实践。他有文集四十卷。统观《全唐诗》保留他的诗作六十九首，足证其言之不谬。他的《帝京篇》十首，词采繁华，内容雅正，格律有致，训诫良深，堪称是实践了自己诗文创作理论的代表作。我们可以认为：

岩廊罢机务，崇文聊驻辇。
玉匣启龙图，金绳披凤篆。
韦编断仍续，缥帙舒还卷。
对此乃淹留，欹案观坟典。

阅赏诚多美，于兹乃忘倦。

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

披卷览前踪，抚躬寻既往。
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
入道虚高危，虚心戒盈荡。
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
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

六五诚难继，三四非易抑。
庶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

这些诗句，仍旧是他的创作理论的继续和宣传。他有名的《威凤赋》，也是用齐梁骈文的旧形式来抒写新内容，平仄协和，韵调畅达，对仗工稳，华实并举，用以警赠功臣。他的主张和艺术实践，直接鼓舞了初唐文坛以“复古”为“革新”风气的扩展，为有唐一代干预政治、关心民生的现实主义诗歌的繁荣，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唐太宗也有一些六朝宫体烙印的作品，但多系早年或晚年之作，是不能与其后来的代表作和主流作相提并论的。传说虞世南有一天接到唐太宗的一首宫体诗，坚不奉和，并且批评太宗说：“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太宗回答说：“朕试卿耳！”虞世南死后，一次太宗作诗一首，“述古兴亡，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此诗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世南灵座焚之”（《唐诗纪事》卷一）。这一故事反映了唐太宗文学主张及其创作的进步倾向。正如《全唐诗》编者评价的那样：“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这一观点无疑是应受到研究唐诗的人们高度重视与深入挖掘的。

2. “直言极谏”与唐诗繁荣

先秦，特别是中古以来的中国诗歌，如果与外国古代诗歌相比较，我认为最大的特点是它与治国安民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外国学者也意识到了。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色时，着重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它将诗归结为心里表白的同时，也把诗说成是对君主的某种道德性、政治性进言……所以，中国诗歌在它初起之时，就带有了政治和伦理的性格，而这种传统一直被继承了下去。”他又强调：“杜甫的诗尤其如此。抒情诗是个人感情的表白，但杜甫认为自己亦不只存在这一层意义。只要看他的《北征》就能了解他对政治怀有何等强烈的关心。”（《吉川幸次郎论中国文学特色》，《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然而，唐代并非只有杜甫一人对政治怀有如此强烈的关心。正如《碧溪诗话》的作者黄彻讲的：“古者帝许百工各执艺事以谏，诗独不得与工技等哉！”“忠臣义士，欲正君定国，惟恐所陈不激切，岂尽优柔婉晦乎？”唐王朝自立国开始，就将

“直言极谏”、“极言得失”，君上认真听谏纳谏，作为基本国策之一法令化下来。每下《令陈直言诏》等诏敕，对那些“表疏因循，尚多迁谈；申请盗贼，不肯至言；论民疾苦，每亏实言；妄引圣哲，深相佞媚；假託符瑞，极笔阿谀；乱语细书，动辄数纸”的违背“直言极谏”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批判，并对那些发扬《孝经》的“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的精神的臣子，进行重奖升擢。这些政策自太宗之后，在其余十九个皇帝统治的时代虽时有歪曲，但基本上仍被执行着。加之正直善良的诗人，又把敢于用自己的诗文去进行“正君定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各系其志”的“直言极谏”，当作“美德”去实践。所以，唐诗在这个重要条件和其他条件的共同促进下，终于空前地繁荣起来。诗人们一个个以“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陈子昂《感遇诗》十九）、“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杜甫《北征》）、“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李白《书赠蔡舍人雄》）、“平生抱忠义，不敢私微躯”（岑参《从军行》）、“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杜牧《郡斋独酌》）“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聂夷中《咏田家》）……为己